

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 资产阶级的构成

张 国 辉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产生的。到甲午前夕，包括工矿、电讯、交通运输等各项企业，粗粗计算，大约有二百四十家左右。^①它们大抵是：船舶机器修造业二十七家，轮船运输业一家，近代煤矿十六家，近代金属矿二十四家，机器缫丝业约一百零三到一百十三家（其中分布在上海五家，顺德地区四十二家，广州地区五十至六十家，浙江、山东、武汉各一家），机器棉纺织业八家，铁路、电讯各一家，其他轻工业四十七家，共二百二十八至二百三十八家。这些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四种形式。大体说来，在这个时期中，大中型的近代企业，基本上都是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有所尝试，并未成功；完全官办的为数不多；完全商办的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在这个时期不占重要地位。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是在外来侵略日益加深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外国侵略者的多次军事打击，迫使清政府统治集团在面临灭亡的恐惧中逐步分化，其中，洋务派官僚企图通过兴办近代企业以挽救危亡。严峻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先行国家有着重大的不同。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是通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三个阶段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变化，犹如马克思所论述：“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

^① 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上述数字仅就我们所见到的中外记载所进行的粗略统计，其中不包括官办近代军用工业。

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① 西欧工场手工业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在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培育了众多的“小资本家”,而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为现代资产者。中国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在西欧机制品广泛侵入和刺激下出现的,一开始就利用外国输入的现成机器设备,基本上没有经历工场手工业阶段。因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自然就不是那些薄有资财的小业主或小商人所能胜任,而只能是原来已有较大积累的剥削阶级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从事于近代企业的经营。虽然,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也不乏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向机器生产过渡,例如轻工业中的轧花、缫丝、织布、面粉、火柴,重工业中的船舶修造等都有一定数量工场手工业的存在。但是,这种现象主要是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亦即是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之后出现的。在甲午之前,从工场手工业发展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即使不能说绝无,但确是比晨星还要稀疏。它不成其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条途径。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中,和占有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工矿、电讯、交通运输企业发生资本关系的,大抵是以下几类人物:在清政府里握有权力,兼有资财的洋务派官僚;依附外国势力,拥有大量资金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旧式商人上层中某些带有新倾向的分子;少数侨商以及一部分略有新知识的缙绅地主分子。这个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物质生产的发展把不同的社会集团结合在一起,在它们之间产生了联系、矛盾,甚至展开一系列复杂的斗争。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分析这种具有新的历史内容的阶级分野,说明不同社会集团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对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页818。

一、洋务派官僚集团

七十年代以后，积极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官僚，主要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僚集团。这个集团又有洋务派大官僚和一般洋务官僚之别。这个集团主观上为着维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与外国势力的频繁交接中，有限度地接受西方生产方式，成为一个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它的代表人物不自觉地扮演了中国近代企业倡导者的角色。李鸿章、盛宣怀便是这一集团的头面人物。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殖民势力对封建中国使用恐怖方法，“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代。^①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势力推向内地渗透。封建经济基础的破坏，又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从而在某些经济部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现象。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李鸿章意识到这种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是不可能单纯地依靠政治方法所禁阻得了的。一八七二年，他明白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②两年以后，他又比较全面地陈述了创办近代企业抵制洋货侵入的主张：“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③李鸿章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封建经济结构已无法维持，提出适应形势的变化进行改革，这是正确的。但是，洋务派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集团。它的活动不能逾越本阶级所允许的范围。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即所谓“求富”，最终是以本阶级的利益为依归的。在李鸿章的思想里，创办营利性生产事业的终极目的在于维持和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255。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页29，（以下简称《李集》）。

③ 《李集》，奏稿，卷24，页20。

展清政府的军用工业和其他暴力工具。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近代企业的兴建呈现初步发展景象时，李鸿章更为完整地表白了他积极支持近代企业的创办，就是为了“裕饷”。所谓“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而“创办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①八十年代后期，他开始重视铁路的修建。然而在他的心目中，“铁路之妙用在调兵运饷，铁路之命脉在商贾贸迁。商贾辐辏之地，多一里得一里之益；商贾稀少之地，多一里受一里之累。”^②这就暴露了洋务派集团不是借建造铁路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利用铁路汲取繁荣地区的财源；而建造铁路的真正目的全在于“调兵运饷”。由此可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集团积极参预近代企业的真正意图，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为清政府寻找续命汤，用李鸿章的说法，就是“为国家建万年不拔之基。”^③历史恰是这样的矛盾，处于近代企业倡导者地位的李鸿章，从其社会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来看，他却是属于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

甲午以前，最能博取李鸿章信任的是盛宣怀。盛在经济领域非常活跃，起着洋务派集团总揽近代企业主要代理人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其使命为“往来查察”^④，换言之，就是为李鸿章监督招商局的业务。这一时期，他曾致力于新式煤矿的经营，未见成效。1879年他建议李鸿章招集资本，创办津沪电线，并在1881年被李委派为电报局总办。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有所发展的时节，盛在上海从事金州煤矿招股工作，并往来沪、杭、苏、常经营私产。1883年底，上海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招商局由于主持人经营失当，遇到了资金周转困难，李鸿章乘机派盛接管；次年又调盛署天津海关道，兼管北洋“洋务”和“商务”。在天

① 《李集》，奏稿，卷39，页32。

② 《李集》，海军函稿，卷3，页28。

③ 《李集》，海军函稿，卷3，页28。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页58。

津，他又利用醇亲王奕譞巡视北洋海陆军机会，极力巴结清室权贵。1893年，为李鸿章操纵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火焚毁，盛又奉派赴沪督办华盛总厂。至此，人们看到，为北洋集团控制的轮、电、煤、纺四类大型企业中，盛宣怀竟操纵其三，足以说明盛在北洋集团中的特殊地位。

盛宣怀还是一个对股票买卖兴趣特大的投机者。七十年代初，盛和招商局总会办唐廷枢、徐润等利用局款，为自己买进正在跌价的旗昌轮船公司股票，然后他们又作为经手人，以高价买下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财产，使该公司股票价格重新上涨，从而盛宣怀等在一转手之间，获致暴利。^① 1883年底，盛又乘金融风潮期中，上海市场股票价格猛跌时机，套购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的股票。及至担任招商局督办和电报局总办后，职务上的方便使他优先获知各企业的内幕和津、沪各地商情变化以及金融动向。不仅止此，他还私下安排亲信在上海坐探，指示他们“如有关系洋务、商务消息，密速禀报，其紧要者即随时公电飞报。”^② 正是通过这些坐探，他在1888年秘密买进招商局股票五百余股，次年又趁英商汇丰银行股票跌价时机，指示亲信“迅即下手，尽数购买。”^③ 从这里，人们不难了解盛宣怀是如何利用公私便利，积累其私人资本的。

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为北洋掌管经济的盛宣怀，当然离不开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七十年代，人们指责他在购买旗昌轮船公司的活动中与美商旗昌洋行的不正常的关系，而八十年代他与英商怡和洋行的关系更加暧昧。根据档案反映：怡和洋行上海行东机昔（W·Keswick）曾在1885年密函盛宣怀说：“谨向阁下证实我们之间所取得的谅解，凡由阁下之影响或由于阁下之介绍

① 参见《洋务运动》，第6册，页42—43。

② 《盛宣怀档案·盛宣怀致孙祥麟函》（光绪十四年十月二日），转引自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

③ 《盛宣怀致雨记函》（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二日），转见汪熙：前引文。

而取得之生意，由敝行将所赚之佣金的半数回报于阁下。”^① 1886年五月间，海军衙门醇亲王奕譞到天津视察，引起了天津、上海各外国洋行为揽取军需订货展开剧烈竞争。盛宣怀特遣一个亲戚到天津，为怡和洋行招揽订货面见奕譞。事情暴露后，盛的计划未能得逞。而怡和洋行的天津行东机昔（J·Keswick）通过盛的亲戚安抚盛说：“决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憎恶的影响。”^② 也就在这一秘密活动期中，上海怡和洋行还收到盛的一笔定期存款二十万两，洋行特给六厘利息。^③ 这些情况表明盛宣怀与怡和洋行具有多么深的默契关系。此外，怡和洋行档案还透露：1887年7月，德国辛迪加在与美国米建威财团的竞争中，就是经过重贿盛宣怀才达成对电报局的一笔贷款。^④ 由此可见，盛宣怀不只是北洋集团控制近代企业的主要代理人，同时还是外国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大买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周旋于中外反动势力之间，长袖善舞，历久不衰的。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制度和半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洋务派集团的头面人物，依靠政治地位进行经济活动，通过控制大型企业谋取政治经济私利。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李鸿章所依靠的主要在他所拥有的政治地位，而盛宣怀则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在政治上，他依仗李的支持和庇护，在经济上，他又通过和外国势力的勾结，厚积资财，伺机收购企业股票，从而达到控制企业的结果。此中不同变化，反映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产生的最初历程。

但是，不能忽视，洋务派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因此也不能把整个集团简单地视同官僚资产阶级。在这个集团中，某些

① 《盛宣怀档案·W·机昔致盛宣怀函》（1885年8月18日），转见汪照：前引文。

② 《怡和洋行档案·上海—香港，致W·机昔函》（1886年5月1日）转见勒费沃尔：《清末西人在华企业》，页85。

③ 勒费沃尔：《清末西人在华企业》，页85。

④ 《怡和密函档·上海—天津，致A·米契函》（1887年7月28日），转见勒费沃尔：前引书，页113。

中等官僚如各地海关道，由于有较多机会接触洋务事物，对于通过近代企业获取优厚利润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例如郑藻如（天津海关道）投资于开平煤矿，刘瑞芬（江海关道）、方汝翼（烟台海关道）、瑞弗候（宁波海关道）等投资于烟台缫丝局，龚照璈（江海关道）、刘汝翼（署天津海关道）之于上海机器织布局，聂缉槩（江海关道）之于华盛纺织总厂等等^①，他们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近代企业发生了资本联系，在必要时也为企业提供一些方便。不过他们大多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只是一面服官，一面分享企业利润。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官僚，由于缺乏权势，为经营近代企业不得不与北洋拉拢关系。其中一部分人与李鸿章夙有瓜葛，如马建忠、杨宗濂、杨宗瀚、戴景冯、朱采、胡家楨、胡恩燮、李宗岱等等。他们为了经营厂矿企业，寻求奥援，几乎都与北洋集团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关系。在经营企业的实际过程中，他们的经历却是比较坎坷，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带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排挤。所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他们虽然一度参与洋务派集团，但是，这个集团的分化和一部分成员的转化，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是明显地存在着。因此，这一部分人，实则是从他们经营近代企业的艰苦历程中逐步转向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后者提供基础的。

二、买办集团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常常出现招徕资本的困难。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就筹集资本而论，清政府财政空虚，无力为民用企业提供资金；掌握财富的地主、官僚和旧式商人习惯于旧的经营方式，即使在新式企业出现有利可图的市场条件，

^① 《招商局档案》，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申报》，1893年12月21日；《李集》奏稿，卷78，页10。

也未尝不是心存观望。因此，比较有资历、有经验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多半都是大买办或买办化商人，而这些人也是在外围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夹缝里求发展的。

买办资产阶级，是五口通商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栽植、扶持而成的一个阶级。这一阶级在沟通中外贸易活动中，积累了雄厚的资历。他们在早期，大多“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①他们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多年交结外国势力，“熟悉中外语言文字”，具备较多洋务知识，同时也在通商口岸的商业社会里，以及口岸和内地城镇之间，在调度货币资金上具有雄厚的力量。因此，七十年代初叶以后，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资金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资金依附外商企业。洋务派大官僚力求以“官督商办”形式争取买办资本，收到一定的成效。

例如，中国第一家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是一八七二年筹建的轮船招商局。最初主持这家企业的是沙船主出身的朱其昂。但他对新式航运业缺乏经验，在招徕资本上也欠号召力量，以致企业面临“股份过少，恐致决裂”的局面。^②到了一八七三年，熟悉新式航务的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入局，才开始出现新局面。

唐廷枢、徐润接手后的十年中，招商局前后两度增招资本，总计达二百万两，主要的是吸收买办资本。其中徐润名下便有四十八万两。^③唐廷枢及其家族中不少人均有相当大的数量的投资。此外还有买办商人刘绍宗、陈树棠、郑观应、李松云等。招商局在上海、天津、汉口、香港、汕头等处的分局商董，也多半由买办人物充当。可见，中国近代航运企业，是在买办商人的主持之下开始的。

唐、徐主持轮船招商局以后，利用业务上的便利，先后创

① 《李集》，奏稿，卷20，页32。

② 《李集》，朋僚函稿，卷13，页13。

③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页37。

办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后来合并成仁济和保险公司。这几家公司的资本仍以买办商人投资为多。其中除上述的唐、徐、刘绍宗、陈树棠等人之外，还有麦加利银行的买办韦华国、汇丰银行的买办唐国泰、柯化威洋行的买办郑秀山，以及唐廷枢家族、买办唐应星、唐静庵等等。^①

当时在上海经营保险企业的华商尚有四家，即“安泰”、“常安”、“万安”及“上海火烛保险公司”。它们的发起人和主要投资人，也无一不是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就目前所知，“安泰”是由一批“和澳洲及旧金山的贸易有联系的最有势力的华商”发起的。^②董事中有广东著名买办甘章，经理何献墀则是曾供职香港殖民政府的侨商。^③“万安”的发起人及“常安”的经理和董事则与“安泰”公司基本上相同^④，而“上海火烛保险公司”的首董就是著名的怡和买办唐茂枝，经理是高易洋行买办李秋坪^⑤。这种情形表明，当时由华商经营的保险业，全部掌握在买办商人的手中。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华商船舶修造业尚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一八五八年有广东籍买办甘章出资兴建“甘章船厂”。^⑥到八十年代，从机器修配业务中逐步发展起来能自造小轮船的如均昌船厂和虹口船厂，它们的主持人都是与外商关系密切的人物。前者如李松云，本身就曾是公正轮船公司的买办，^⑦后者如张子标是一个与洋商关系非常密切的商人。^⑧

① 分见《申报》，1875年11月5日；《沪报》，1889年3月30日；《万国公报》，1878年1月5日，1883年1月20日。

② 《字林西报》，1877年3月14日，页239。

③ 《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1880年，页205；《沪报》，1886年5月2日。

④ 同上，1880年，页205—206页。

⑤ 《字林西报》，1882年11月14日，页466。

⑥ 《北华捷报》，1859年1月15日，页95。

⑦ 《北华捷报》，1869年12月22日，页623，625—626。

⑧ 莱特：《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页532。（以下简称《商埠志》）。

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烟台出现的缫丝工厂，主要的发动者也是买办商人。一八八二年，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华商丝厂“公和永”，是由一个和洋行关系密切的湖州丝商黄宗宪创办的。^①黄同时又是上海丝业公所领头人之一。^②这个公所主要就是由一批从事于生丝出口贸易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组成的。一八八五年，在上海租办英商公平丝厂的华商，是供职于外国洋行的“伙友”，^③他们无疑是买办或买办化商人。九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源昌缫丝厂以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为主要的股东。^④至于华北缫丝中心烟台，一八八三年盘顶德国商人经营的“烟台缫丝局”的华商就是大买办唐茂枝。^⑤

七十年代后期，是中国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动时期。在这个行业中，买办商人的活动也是非常活跃。一八八七年，彭汝琮在李鸿章“力为保护”之下，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充当会办和帮办的就有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和卓培芳，庚和隆洋行买办唐汝霖。当时外国报纸宣扬，在彭汝琮的背后有一个由“中国商人组织的联合公司”作为他的支持者，而“公司资本主要出自商人”。^⑥显然，这里所说的商人是指郑、卓、唐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买办化商人。可作佐证的是，一八七九年，上海织布局第一次改组，因郑观应离局而紧随之撤股的，就有一批广东籍的捐客和茶商。^⑦不言而喻，这批捐客、茶商的资本的流向，是视郑观应的去留而决定的。

这一时期兴起的中小型资本主义企业，创建人也大多是买办或买办化商人。例如，一八八二年上海第一家面粉厂，即裕泰恒火轮面局的创办人，就是先后充任过协隆洋行、太古洋行、太古

① 《北华捷报》，1882年1月17日，页63；《新报》，1882年1月4日。

② 《北华捷报》，1902年7月16日，页131。

③ 《申报》，1885年3月20日，1887年12月22日。

④ 《商埠志》，页548。

⑤ 《申报》，1883年7月25日。

⑥ 《北华捷报》，1879年1月17日，页45。

⑦ 《字林西报》，1879年4月2日；《申报》，1879年4月3日。

轮船公司的买办陈可良^①；同年成立的第一家玻璃厂，即中国玻璃公司的创办人，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怡和买办唐茂枝；^②同年成立的第一家造纸厂，即上海机器造纸总局的主持人曹子俊、曹子勃都是禅臣洋行的买办。^③八十年代前期成立的最早的轧花厂，即棉利公司，就是一个和洋行交往密切的买办化商人丁玉墀创办的。^④一八八八年设立的第一家机器碾米厂，即源昌碾米厂的创办人，是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⑤而一八九〇年设立的第一家火柴厂，即燮昌火柴厂的创办人叶澄衷，则是一个依附洋商起家的买办化商人。^⑥

这种以买办或买办化商人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情况不限于上海。上海以外的地方也不乏其例。比如，天津的第一家火柴厂，即一八八六年成立的天津自来火公司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就是天津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⑦一八八七年，宁波的第一家轧花厂，即通久轧花厂创办人为严信厚，虽非买办，但有材料反映，这是一家“依附在日本人保护之下的工厂”。^⑧说明它的创办人乃是与外国势力有联系的。而设在香港第一家华商糖厂，即一八八二年的利远糖厂曾吸收了不少买办资本，徐润就是它的主要投资人之一。^⑨

这一时期的近代矿冶业也是买办资本的活动场所。唐廷枢主持开平煤矿，除了吸收徐润、郑观应、吴熾昌等买办的资本外，还利用其长兄唐茂枝在上海的“巨大势力”，吸收了一批“港粤殷商”的资本。^⑩先于开平煤矿创办的安徽池州煤矿的主持人，

① 《申报》，1882年9月11日，1884年1月1日；《商埠志》，页548—550页。

② 《申报》，1882年8月2日。

③ 《申报》，1882年8月12日。

④ 《申报》，1891年12月16日。

⑤ 《商埠志》，页548。

⑥ 《商埠志》，页560。

⑦ 拉斯暮森：《天津》，1925年版，页268。

⑧ 《北华捷报》，1888年8月4日，页43。

⑨ 徐润：《年谱》，页82。

⑩ 《新报》1878年3月14日；《北华捷报》，1897年9月3日。

是一个充当过汉口宝顺洋行买办的杨德；徐润、唐廷枢也是这家企业的主要投资人。^①

金属矿的情形也大致相似。一八八三年由买办李文耀主持的承平银矿，经唐廷枢、徐润的协助，争取到不少买办商人的资本。^②这家银矿在天津的代理人，就是当地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③同年，安徽境内第一家铜矿，即池州狮形洞铜矿也是由买办杨德主持的。^④广东境内的第一家银矿，即一八八九年开采的天华银矿，先由买办商人何猷墀创办，后改由唐廷枢、徐润主持。^⑤

人所共知，买办首先是在流通领域里活跃的一批所谓新式商人。他们沟通中外贸易，为外国商品向内地扩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他们又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参身通商口岸的金融业，利用钱庄职能，签发庄票，调动社会资金为自己的买办活动服务^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增加开辟通商口岸的同时，买办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了。他们从为洋行、洋商服务的过程中发展为直接从事丝、茶、鸦片贸易以及买卖金银等活动，从中积累起雄厚的资本，成为人们能够觉察到的一股社会力量。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买办经营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大量的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流注。理论上，投放到生产领域的任何资本，都必须按照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进行增殖。不过中国近代企业是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进入生产领域的买办人物乃是人格化的买办资本在发挥作用。他们所主持的近代企业，不能不受到买办与外商的旧有人事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制约。事实表明，不少买办人物在创办或主持中国近代企业的同时，往往还经理外国洋行的业务；更常见的是，他们既把资本投放到中国近代企业中去，

① 《字林西报》，1883年1月10日。

② 《沪报》，1889年1月19日。

③ 《北华捷报》，1883年10月10日，页421—422。

④ 《申报》，1891年7月8日。

⑤ 徐润：《年谱》，页45、47。

⑥ 参见拙稿：《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同时又不忘情于对国外洋行企业的附股。这种一身而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李文耀等等，他们在参预中国近代企业之后，总是摆脱不了对外商的旧有关系。试以唐廷枢为例，一八七六年是唐辞去怡和洋行买办，投身洋务派企业的第四年；怡和深知他在洋务派集团中是李鸿章十分倚重的人物，极想利用唐和洋行的旧日关系，对李鸿章施加影响。当年八月间，怡和力图借修建铁路，开发矿山的时机渗透势力，特指示它的代表莫里逊去找唐廷枢，伺机会见李鸿章，表示怡和洋行愿对中国铁路、矿山或其他工程提供短期贷款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支援。^①果然不久，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莫里逊顺利地见到了李鸿章，详陈款曲。^②十分明显，这中间唐廷枢无疑是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的。如果说，此项活动还只说明唐离洋行不久，在短期内难免与洋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末请看一八八五年秋，在唐廷枢放弃买办身份参与洋务企业已达十三年之久，他所主持的开平矿务局已是规模初具，但一度因资金紧张，向怡和洋行试探贷款。怡和主持人机昔认为这是染指开平的良机，便满口答应，但要求贷款的条件，必须是该洋行全面接管开平矿务局的经营管理。^③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包藏攫夺开平煤矿主权的侵略阴谋。据怡和档案记载，李鸿章对此一度感到犹豫，而一向在开平揽权的英国总工程师金达和充当李鸿章洋顾问的德璀琳，则千方百计为实现怡和的阴谋，对李鸿章施加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惊异的是，充当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唐廷枢竟然也完全赞同怡和的条件，并在十一月间向李鸿章送去禀帖，表示支持怡和洋行全面控制开平矿局的要求。^④应该说，这个行动的性质是无须分析就能一目了然的。如果这一次贷款不是由于清政府内部的反对，英国势力掠夺

① 勒费沃尔：前引书，页109。

② 《怡和档案·上海—香港，〈致W·机昔函〉（1876年9月28日），转见勒费沃尔：前引书，页110。

③ 勒费沃尔：前引书，页79；《新报》，1885年12月8日。

④ 勒费沃尔：前引书，页79—80。

开平就不必等到一九〇〇年利用八国联军侵略时机，施尽威胁诱骗种种丑恶手段了。

不仅如此，八十年代初期，李鸿章调唐廷枢长驻天津，专管开平矿务，同时协助他处理洋务，参预北洋机密。唐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时将尚未公开的某种决定私下透露给怡和洋行。例如，一八八九年，清政府对修建国内铁路作了广泛讨论和规划。唐廷枢得悉某些拟议和决定，便将广州汉口间将于一八九〇年修建干线以及准备举借外债的计划，透露给怡和洋行的“老朋友”，^①以便他们在贷款竞争中早作准备。作为北洋集团的智囊之一，唐廷枢的这种行径是他的职守所不能容许的。

严峻的事实反复表明，唐廷枢在出任官督商办企业的总办后，虽然不复具有买办的称号，但是，他对于怡和洋行的关系实在很难用“藕断丝连”四字所能概括得了的。马建忠在一八八四年指出，怡和洋行对待唐廷枢“犹挟主奴之见”。^②这种说法不是完全出于单纯的鄙薄情绪，而是触及了买办和洋行关系的本质。

作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买办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的七十年代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呈现为买办队伍的扩充，通商口岸之间或口岸与内地之间，买办的商业流通渠道初步形成，以及买办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活动中积累起庞大资本等等，都使得以买办为社会基础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自然，对于买办阶级成员的活动和作用也必须作阶层分析。投资近代企业的买办人物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先后依附李鸿章，充当北洋集团经营近代企业的代理人。他们代表了买办阶级的上层。在他们的周围还聚集着一批有相当资力，但缺乏条件夤缘权要的买办。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买办阶级的上层也

① 勒费沃尔：前引书，页118。

② 《盛档·马建忠致盛宣怀函》（1884年5月31日），转见汪熙：《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

会出现分化的现象。这种分化除了来自经济上的原因，即对待中国经济发展前途的不同要求外，还因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买办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应和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人们可以看到甲午以前郑观应的态度和行动与唐廷枢、徐润颇不相同。这预示着他们在以后的去向将是有所不同的。

买办阶级的中下层，是一批与封建权要没有联系或联系甚浅的买办或买办化商人组成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人数众多，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早年洋务派官僚力求招徕“诡寄洋行”的买办资本，就包括这一部分人的资本在内。不过，这一阶层的动向往往受本阶级上层分子所左右。洋务派在争取到买办阶级的上层人物后，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在经营近代企业的实践中，他们的经济利益常常遭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损害，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例如池州煤矿的杨德，上海织布局的卓培芳都可视作代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也经历着分化的过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转化为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

三、旧式商人的上层

在七八十年代，旧式商人的上层中带有新倾向的人物，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旧式商人的上层人物如沙船商出身的朱其昂、朱其莼，钱庄主出身的经元善，苏北盐商李培松，沪上富商蔡鸿仪、票号商王熾，以及李金鏞、谢家福等等都参与新式企业的经营，活跃一时。他们的活动反映了私人资本向新式企业发展的倾向，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过程中富有意义的事情。其中朱其昂、经元善的经历和活动，很可以说明这一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

朱其昂出身于沙船世业的淞沪巨商。^①一八六二年任江苏海

^① 《汇报》，1874年10月16日。

运局会办，^①并“纳资为通判，累至道员”。^②海上运输有赖商业金融的支持。朱其昂与南北各地商人夙有联系。因之，他在从事海运业务的同时，又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开设华裕丰汇银票号。^③李鸿章在一八七二年指派他筹备轮船招商局时，就曾盛赞朱其昂“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外国航运业已经在南北一些重要口岸伸展势力。租雇洋船从事贩运贸易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是各口岸最见活跃的人物。出于业务需要，朱其昂不可避免地在海运活动中要与这批买办商人发生联系。例如，伙同洋商在烟台合办清美洋行，并自备轮船往来上海、烟台、天津各口的买办李振玉^⑤与朱其昂就有较深的关系；而拥有巨资和四艘轮船，甚至使外国洋行老板都要另眼相看的旗昌轮船公司买办陈竹坪与朱的关系也非一般。^⑥所以，朱对于新式航运业也积有一定的常识。李鸿章称他“习知洋船蹊径”，^⑦不是毫无根据的。结合这些情况来看，朱其昂显然是从旧式商人营垒中游离出来具有新倾向的人物。

但是，也应指出，朱毕竟对新式航业缺乏全面的了解，他在筹办轮船招商局的初期，虽宣扬“自以身家作抵”，并未能取得旧式航业的资本支持。而在轮船业务上，他又因“不识洋文，不通洋话”，对各船雇用的洋员“不能驾驭”，^⑧对招徕买办资本也缺乏号召力量。所以，招商局在初创时，便“资本不敷，招集商股甚微”，^⑨以致朱主持局务仅仅半年便不得不进行改组。在改组后的招商局里，朱一直担任会办，专管漕粮运输。

① 《民国上海县志》，卷17，页4。

② 《清史稿》，列传，卷239。

③ 《李集》，奏稿，卷41，页38—39。

④ 《李集》，奏稿，卷20，页33。

⑤ 《北华捷报》，1882年3月15日，页294。

⑥ 《北华捷报》，1875年8月28日，页213；《燎记洋行档案》，转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页100。

⑦ 《海防档》，购买船炮，页910。

⑧ 《招商局历办实在情形禀》，见《招商局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⑨ 见《招商局档》。

在朱其昂的经济活动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八七七年从事航业之余，购买磨粉机器，在天津雇佣十余工人，创设贻来牟机器磨坊，规模虽然狭小，却不失开中国机器面粉业的先河。^①

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第二年，朱其昂在天津去世。就朱所处的时代而言，他的经历和活动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旧式商人上层中一部分带有新倾向的人物的转化过程。转化的条件全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在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初创时期，出现了象朱其昂这样一类商人的转化，无疑是富有历史意义的。

出身于浙江上虞商人世家的经元善，五十年代后期来到上海继承父业，以旧式金融业者身份出入十里洋场，历任北市钱业会馆董事，^②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扩大对华商品侵略，促使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上海钱庄在买办化轨道上加速步伐。作为一个钱庄主，经元善经常与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发生业务联系，耳濡目染，向往于外国企业的集股经营；在公益事业活动中，他又有机会与官场相接触，一八七九年，在赈务活动中，他结识了盛宣怀。^③次年又经郑观应力荐，参与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嗣后又主持上海电报分局。^④

适应这一时期私人资本要求发展的愿望，经元善在参预主持上海织布局集股活动中，改变了前此招商局、开平煤矿集股时端赖主持者“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作法，在国内重要商业城市和海外侨商集中地，公开登报，招徕股金，并公布投资人的姓名。此项办法对当时各地中小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情绪起了刺激作用。它也意味着，到了八十年代，近代企业资本的集腋开始突破了商帮亲友的狭隘范围，向国内重要城市和海外侨商集中地扩大。

① 《北华捷报》，1878年6月15日，页615；《申报》，1878年12月14日。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页35。

③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页31。

④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页30。

经元善倡导的集资方法曾获得广泛的支持，即他所谓“商务联群机械已将萌芽勃发”。尽管这个带本质性的问题，未必为当时的企业活动家所充分意识到，但却是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

朱其昂、经元善的经历和活动，可说是从不同方面为旧式商人上层分子的转化，提供了带有积极意义的范例。不过，就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而言，他们的转化总是不能摆脱封建势力的干预，也不能免除与外国势力的联系，缺乏独立自主的力量。朱其昂只是到了晚年才在招商局的活动之外，独立经营了一个小型的面粉厂的，而且未及正式开工便去世了。^① 经元善在经营近代企业方面可说是一个能手，然而在甲午之前，尽管他对洋务派的经济政策已经责有烦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未摆脱盛宣怀的羁縻。他的企业活动也只局限于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局，缺乏独立的作为。其他如资历雄厚的盐商李培松的投资只限于织布局、电报局和峰县煤矿等官督商办的企业。八十年代票号商王熾在唐炯督办云南铜矿期间，曾以巨款贷予矿局，并且以他开设的票号作为招徕资本的号召，^② 却始终不曾独立创办或经营新式企业。李金镛、谢家福等在经营新式企业上都表现了较高的能力，然而他们的活动也始终依傍洋务派，寄奢望于官督商办企业，非常缺乏独立创业的勇气。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客观上的原因，但就阶级产生的角度来考察，处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使自己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看来还有待于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和结合，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一阶级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至于旧式商人的中下层，在甲午之前，总的说来还对近代企业采取观望态度，暂时还不大愿意改变自己一向习惯了的营生方式。

① 参见《北华捷报》，1878年6月15日，页615；7月6日，页6。

② 《申报》，1887年8月6日；周钟猷等：《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版，卷235，页8。

四、华侨商人

华侨对国内近代企业的投资，是民族资本组成的一个部分。过去，人们对于华侨商人投资于祖国近代企业的历史不曾给予应有的注意。今天由于历史资料尚未充分挖掘，我们也还难以估计侨商资本的数量及其在新式企业中的历史作用。就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一八七三年，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设的继昌隆缫丝厂，是近代华侨商人独资经营的第一家近代企业。它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史上是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陈启沅生年不详，根据他的经历推测，他大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一个“世代以农桑为业”的家庭。^①在年轻时，陈曾“两赴童子试”，有志于科场，^②但都未如愿以偿。一八五四年出国经商。二十年中遍历南洋各埠，注意当地植桑养蚕和缫丝等业。所以，他的儿子追述他是一个“经商海外，然未尝忘农桑之业”的人^③。一八七二年回国后，在南海简村创办机器缫丝厂，成为第一家侨商资本的近代企业。

甲午战争以前，像陈启沅那样在国内独资创办新式企业的侨商还不多见，而投资于官督商办企业的却是不乏其人。例如，一八七九年，轮船招商局曾派遣广东试用道张鸿禄、候选知县温宗彦到南洋、新加坡一带考察航运事业，同时招徕华侨资本。他们在暹罗之孟角（曼谷）“设立机器砮坊”，并在“众所信服”的侨商陈善继（系驻新加坡、暹罗领事陈金钟之子）协助下，为轮船招商局招集到一批华侨股金。根据招商局档案记载：当时响应号召的多数是广东籍侨商，也有少数福建籍侨商，有姓名可稽者共有二十八人。各人的投资额最高为五千两，最低为五百两，多数在

① 陈启沅：《蚕桑谱》自序。

② 陈启沅：《蚕桑谱》自序；何炳堃等纂：《续修南海县志》，宣统二年刊，卷21。

③ 陈藩轩：《蚕业指南》自序。

二、三千两，一共募集到股金五万两。^①次年，温宗彦从曼谷到达新加坡，又在当地募股，应邀投资的有三十六人，集得股金六万五千二百两，投资人中有后来声名显赫的广东大埔侨商张振勋，当时，他的投资额为三千六百两。^②

一八八〇年，经元善、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也曾向旧金山、南洋、新加坡、长崎、横滨等城市募集华侨股金。^③但我们迄今未能发现各该地侨商投资的具体情况。从招商局在南洋、新加坡集股得到侨商热情支持的情形来看，估计上海织布局的私人资本中，当不乏侨商资本。

一八八五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为创办台湾商务局，派前浙江候补知府李彤恩和广东试用道张鸿禄，到南洋去募集资本，曾招集到闽籍侨商陈新泰、黄广余等人的投资。^④此外，一八八五年兴建的山东平度金矿，到一八八九年，经改组和宁海金矿合并，也有旧金山侨商林道琚的投资。^⑤据说林曾在旧金山“设局招股，共集洋元三十万”。^⑥顺便在这里指出，华侨富商张振勋在甲午之前已投资国内资本主义企业，当时还只是作为一般的附股者。至于他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交结官府，奉派以考察南洋商务大臣身份，出国争取侨商资本的活动，乃是甲午以后的事情。这表明在侨商中逐渐发生的分化，是二十世纪初期出现的社会现象。

上述事实说明，海外侨商是关心祖国近代企业的创建的。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国内近代企业得不到正常发展，以致侨商的投资屡遭亏损，阻碍了侨商资本的大量回归。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一部分商人、

① 《招商局禀 [李鸿章]》(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招商局档案》。

② 《唐廷枢等禀李鸿章》(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招商局档案》。

③ 《上海机器织布局启事》，《申报》，1880年11月17日。

④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5，页19。

⑤ 《矿务档》，第2册，页1324。

⑥ 《李集》，电稿，卷12。

买办、地主和官僚，通过近代企业的经营活动向资产阶级转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在产生过程中依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可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①洋务派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最初萌芽。他们的结合开始酝酿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历二三十年的发展成为客观现实。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清政府当权的洋务派为了拯救地主阶级的统治，有必要通过大买办博取外国势力的支持；而依附外国势力成长起来的大买办在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则需要大官僚的庇护。日益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这两股势力在压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共同目的上，走到了一起。十分明显，它们的结合，必然是中国政治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加深，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人数众多、缺乏权势的一般商人、中小买办、地主和官僚转化而来的中小资本家。这种转化不是一下子出现和完成的，而需要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共同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向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他们投放到近代企业中去的资本实现增殖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能割断与封建经济、封建政权所保持的密切联系，有的甚至还与外国资本主义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在一定时期，他们也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制的要求。这种情形充分说明了这一阶级先天具有的两重性。两重性造成软弱性，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政治和经济的特点。这种特点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所以，在甲午之前，处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页602。